

論卡特的作風與其聲望的起落

林岩哲

一、一位有不平凡主張的平凡人

三十多年前，已故名政治學家拉斯基評論美國的總統制度時，曾寫道：「根本而言，沒有任何一個外國制度可與之相比，因為根本就沒有一個可與其相比的外國制度。美國總統多少像位國王，也多少像位首相。」^①事實上美國總統確是如此。他是國家大典的元首，也是立法的源泉，行政與外交政策的最後決定者，又是其政黨的領導人。在世界上任何人的政治地位可以說都不及他。

不過拉斯基又認為，美國總統的政治地位雖高。權力雖大，却不能完全控制國會，也不能不重視民意的趨向。他說：「若果成爲一位成功的總統，他就不應超越時代過遠。他必須用當時一般人的眼光來看一切，因為他代表一般人民而負責。無論要作什麼事情，他一定要博取諒解；爲了博得諒解，他的政策絕不可遠離當時人們的看法，而使人無法瞭解。」所以拉斯基這段話的意思，無異表示，美國總統雖然有崇高的政治地位與極大的權力，他還得婉轉地去運用，才不致於遭受失敗。他應該要作一位像白志浩 (Walter Bagehot) 所說的「有不平凡的主張的平凡人」(an uncommon man of common opinion)。^②

如果我們回顧卡特的出身和他就任總統後的作風，顯然的，我們可以發現，與白志浩所描繪的美國總統的形像恰恰相反，而是一位「有不平凡的主張的平凡人」。他不像過去歷任的總統：他沒有富裕的家庭背景，他未曾在貴族大學裏受過教育。在未踏入白宮之前，他更未曾服務於華府，因此不具有任何華府傳統氣質。當他走進白宮之際，人們都把他看作一位反華府的「平民主義者」(populist)^③。事實上，他初任總統時的一連串的作風，也無非在盡量地自我表現這一點。所以他在寒風刺骨的就職大典日子裏，漫步貫穿賓夕維尼亞大道上；在總統爐邊閒談節目中，僅身着一件羊毛便衫；他走遍新英格蘭地區，拜會各地鎮民大

註① Harold I. Laski,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An Interpret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40), p. 23.

註② *Ibid.*, p. 45.

註③ Robert S. McElvaine, "Jimmy Carter: Populist or Politician?" *Intellect*, CVI (April, 1978), 368-71.

會；隨處夜宿民舍；參加電視一問一答的節目。

不過卡特畢竟是華府的一位生客，他不是拉斯基所想像的那一類傳統式的總統。他還得「在白宮接受在職訓練」^④。過去他所認識的美國總統制度是來自赫斯(Stephen Hess)和紐斯達特(Richard E. Neustadt)的著作^⑤。他所瞭解的外交事務，是當年在三邊委員會(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與布里辛斯基共事期間所得的片斷知識。所以卡特就任總統之初，強調他將加強所謂「內閣政府」，各種政策的釐定將分由各部會負責，而不再是帝王式的集中在白宮。他要作一位像海斯所說的，美國第一位不重政策實質，而重視過程的總統(a process President)^⑥。他也要作一位像紐斯達特所說的，身如老師般的總統(The President as teacher)。他要他的閣員每週按照他的出題，提出書面報告作業。他就像老師批改學生作業般，耐性地逐字細閱報告、批註、甚至校正文法，而後發還。^⑦

正因為卡特出身平凡，他的思想來源不是單方面和整體的，而是多方面和綜合的，所以他需要有一套「不平凡」的主張，來掩飾他的「平凡的品格和背景」，他認為羅斯福的「新政」，杜魯門的「公平政策」，甘迺迪的「新境界」、詹森的「大社會」，都是為解決美國國內問題而提出的政策，不足以表現出不平凡之處；所以他特別提出「人權政策」，來涵蓋整個世界而不單是對美國一國的政策，以顯示他的「不平凡」。固然，他不像老羅斯福，公開承認白宮是「最好的佈道壇」(a bully pulpit)，但是他自始即以道德領導者自居，從不放棄他的人權佈道，甚至公然痛斥盟邦。

卡特是充滿自信的人，而且表現堅定、耐性、甚至固執不移。因此他可以竭其全力去達成所謂「中東和平架構」。一般說來，這種「架構」，絕不是過去歷任美國總統所願親自斡旋並以無限耐心去完成的。有人說，卡特對蘇聯的政策沒有原則。其實他始終堅持兩個原則：(一)對站在左邊與布里辛斯基一起的人說：「我們絕不容許蘇聯在我們前後左右來逼迫我們」；(二)對站在右邊與范錫一起的人說：「我們要與蘇聯友好。」^⑧正因為卡特不輕易改變自信心的緣故，他在一九七七年極遺憾而憂傷地接受預算管理局長藍斯掛冠之際，仍向藍斯說：「我以你為榮。」他又鄭重的向美國人說：「藍斯是我的朋友，我非常了解他，就像他是我的親兄弟一樣。我心中絕對相信，他是一個好的、誠實的人。」卡特認為，藍斯作為一位預算管理局長，是「最有能力最有才智的人」。從卡特處理藍斯事件的方式，更可看出他自信固執的個性。

註④ John Dilin, "Carter's First Year: Wintury Assessment," i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11, 1978, pp. 1 and 26, at p. 26.

註⑤ See Richard E. Neustadt, *Presidential Power* (New York: Wiley, 1960), esp. chap. V; Stephen Hess, *Organizing the Presidency* (New York: Brookings, 1976).

註⑥ See William V. Thomas,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Editorial Research Report*, V. 4 (July 28, 1978), 558.

註⑦ David Enson, "Jimmy Carter Up Clos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10, 1978), p. 11.

註⑧ Emmet John Hughes, "The Presidency vs. Jimmy Carter," *Fortune* (December 4, 1978), pp. 50-64, at p. 58.

二、隨機應變的變色龍

卡特對於所追求的目標，雖然鏗而不捨，甚至固執不移，但是他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却充分表現出他的善變。他承認過去對華府缺乏經驗，所以頭一年的總統「在職訓練」，使他洗脫了南方人的保守氣質與濃厚的歷史意識。同樣地，他曾表示，在就任總統的頭一年裏，不擬出國訪問，將專心致力於解決國內問題。但是他隨即發現，喬治亞州長和美國總統的職位有一項很大的差別，那就是美國總統還要多一層職務，處理外交問題。^⑨所以卡特在就任總統不久，即於一九七七年五月，前往倫敦，參加工業國家高峯會議；同年十二月，他又起程作歐亞六國之旅，從事於所謂「卡特主義」的外交活動。由此可知，卡特爲了隨機應變，達成目標，雖自食諾言，亦在所不惜！

以一位美國總統的工作態度來說，無可否認的，卡特是一位要從學習中來彌補經驗不足的總統。他曾經表示過，他將要作一位有爲而又偉大的總統。他的偶像總統是羅斯福和杜魯門。這兩位總統都是民主黨籍，並曾被哈佛教授史勒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Sr.) 於一九四八及一九六一年先後徵詢許多專家意見之後，列爲偉大和近乎偉大的總統。不過卡特的幹勁却與共和黨的胡佛總統「伏案」(run a desk) 精神相類似。卡特也和胡佛一樣，原本學的是工程教育。他們同樣是以工程師的態度來經營他們的政府「機械」。此外，卡特的另一項特質，使我們聯想到另一位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卡特也像艾森豪一樣，是從黨爭的污穢氣氛中脫穎而出的政壇新人。雖然卡特出身於民主黨具有深厚勢力的美國南方，但他也像艾森豪不是純粹的共和黨員一樣，就任總統後的卡特也不像一位民主黨的總統。在國會裏，民主黨雖然控制了多數，但與卡特步調趨於一致的，却多爲共和黨籍的議員。不久前有人問他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差別，他很簡要地答覆了一句話：「你無法在其間劃分出界線來。」^⑩

在承認中共一事上，更充分表現了卡特只顧追求目標而不堅持原則的應變本質。他當選總統之後，接受電視訪問時，曾鄭重地說：「我很謹慎地作了各項承諾，我將信守這些諾言。」承認中共是一九七六年卡特在競選時所作的一項承諾。正如他當時對韓國撤軍的承諾，他將不顧一切阻力予以實踐。

爲了實踐與中共「正常化」的承諾，首先卡特在就任總統後的一個月，便通知當時中共「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黃鎮，表示與中共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意願；到一九七七年八月，派遣國務卿范錫前往北平，作建立「正常化」的試探。但是中共仍然堅持斷交、廢約、撤軍三條件。范錫只得鎩羽而歸。所以到一九七八年五月，再有布里辛斯基的北平之旅。從此美匪之間的「正

註⑨ 白宮幕僚長約旦說：「州長與總統沒有差別，惟一的例外，就是總統多了外交政策的責任。」見 Don Bonafede, "A Report Card on Carter,"

National Journal, X, 2 (Jan. 14, 1978), p. 49.

註⑩ Hughes, *op. cit.*, p. 53.

常化」談判便從國務院轉移到白宮秘密進行。^⑭

猶記卡特在競選總統期間，曾抨擊福特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我們已喪失了美國人的特質。我們忽視或排斥美國人民和國會參與制定我們的外交政策。這是秘密而排他的外交政策。」^⑮所以卡特在就任之初曾強調公開的外交，着重內閣的決策過程。同時在推展與中共「正常化」工作上，卡特也曾公開表示關切臺灣的安全與和平。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卡特在一次記者會中，曾鄭重聲明，在與中共正常化的過程中，「必須確定中華民國臺灣人民的和平生活。」他甚至在一九七八年八月還公開表示：「我們終極目標之一，就是與中國（共）有正常的關係，但是這種推展的步調是相互的事情，中國（共）和我們都是有耐性的。」^⑯這也就是說，中共所提出的斷交、廢約、撤軍三條件，還不能為卡特所接受。

但是，卡特就任總統以來，政績平平，而在外交方面，更是一無是處，正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所說的，「美國外交政策一團糟」^⑰。卡特本人也承認：「在許多重要問題上，不能進一步地推展，以證明成就，使我時時感到沮喪。」^⑱因此他想在外交上，力求表現。自從一九七八年九月大衛營中東高峯秘密會議以後，他學到了一項經驗。他說：「在我的經驗中，與外國領袖磋商具有敏感性而又錯雜的協議，要是透過新聞媒介的報導和大眾的討論，再加上國內立場分歧的領袖來發表不同的意見，將使這種協議無法達成。」^⑲所以卡特在大衛營會議之後，為了推展美匪「正常關係」，隨即在九月十九日會見「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柴澤民，進行秘密會談，同時更授權予伍考克在北平繼續與中共從事「建交」的秘密磋商。終於十二月十五日，在完全屈從中共所提三大條件之情況下，宣告與中共「建交」，完成了卡特所謂的「最後歷史性協議」。

此一事例，最足以說明卡特為了追求目標而從權應變的一貫作風。他為了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不惜放棄他本人反對秘密外交的原有立場，而與北平進行一連串的秘密談判；不惜違背其前任所定不犧牲中華民國的原則，而全部接受了北平所提的「建交三條件」；更不顧大多數美國民眾和國會議員的反對，而故意選在國會休會期間，宣佈「美匪建交」。卡特的這種作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一位特派員描寫的恰到好處。他說：「熟知卡特的人，稱卡特是一條變色龍（Chameleon），能隨周圍環境而改變顏色——當周圍跟他配得好時，會使人覺得悅目可賞，却也會很快的變得像冰一樣的冷漠。」^⑳

註⑭ 據日本朝日新聞報導，美匪之間的秘密談判是在布里辛斯基訪問大陸之後，即由國務院轉入白宮頻道秘密進行。見 *Asahi Evening News*, December 18, 1978, p. 2.

註⑮ Quoted in *China Post*, December 30, 1978, p. 2.

註⑯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21, 1978), p. 27.

註⑰ See "The Mass in Foreign Policy,"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uary 28, 1978), pp. 27-29.

註⑱ *Ibid.* (July 24, 1978), p. 17.

註⑲ Quoted in *China Post*, December 30, 1978, p. 2.

註⑳ Enson, *op cit.*, p. 11.

二、「謎」樣的行情

數十年前，時事評論家懷特 (William Allen White) 哀悼胡佛失去總統職位時，憂傷地寫道：「住在白宮裏的人，不應以英勇德性和匿名措施，而感到自足。他一定要像演戲般地且說且唱。」^①卡特深知胡佛的一切，自然記取了這一教訓。

的確，政治也要像演戲一樣，從序幕揭開之後，劇情的演變有高潮的時候，也有低潮的時候。但是在一段低潮之後，應該意外地推出驚人的一幕，製造劇情的高潮，博得觀眾的喝采。卡特對於此道，更是精通。他在白宮「唱作」了一年多，眼看觀眾反應冷淡，於是在一九七八年九月，特別排出大衛營的一幕，使他獲得第一次的喝采，也使他的聲望起死回生，重新「復活」了。^②卡特陶醉在喝采之餘，自然不會忘記耶誕新年假期即將來臨，更需要高潮戲和喝采聲來點綴，以歡度一個「愉快的耶誕與快樂的新年」。因此，卡特在第一次喝采接近尾聲之際，便以打「中國牌」的方式，出人意外地推出一幕驚人的把戲，希望由此博得另一次的喝采高潮。

固然，有許多人認為，卡特所以要使出一張「中國牌」，是受布里辛斯基的影響，旨在對抗蘇聯在亞非地區日益擴張的勢力。其實，這種看法是由於只看到部分牌局的結果，也是由於不夠了解卡特的個性而產生的一種錯覺。我們如果觀察整個牌局，便會發現，卡特這次打出的所謂「中國牌」，不是一張真正的王牌，而只是在他個人短門牌上所投出的墊張。

我們應該記得，當初卡特走進白宮之際，是何等的正氣凜然，是如何的懷有崇高的抱負。他在宣誓就任美國第三十九任總統時，曾引用了聖經裏的一句名言：「世人哪！上帝已指示你們何謂善。他還能向你們要求甚麼呢？只要求你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之心，與你們的上帝同行。」^③這是何等崇高而令人肅然起敬的誓言。三十多年來，美國社會受盡了暴亂、越戰、水門事件、和經濟萎縮的種種折磨，導致民心渙散、信心消失，國勢日衰。卡特的獻身精神與忘我犧牲的號召，曾經鼓舞了美國與自由世界新的希望。據當時哈里斯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六十一的人預料卡特將成爲一位偉大的總統，四分之三的人認爲他會幫助窮人與弱者，百分之六十九認爲他對黑人與其他少數民族一視同仁，百分之六十四的人認爲他能恢復一般對白宮的信心，百分之六十二認爲他將爲中低收入者提供減稅措施，百分之五十八認爲今後政府中的道德水準將會提高。^④卡特當選總統之後，也曾把他在競選期間許下的許多諾言，分門別類地編成一百一十一頁的目錄，公諸於世，以取信於民。^⑤所以根據蓋洛普民意測

註① Quoted by Hughes, *op. cit.*, p. 64.

註② See *Newsweek* (October 2, 1978), pp. 8-11; *Time* (October 2, 1978), pp. 6-9.

註③ 關於卡特宣誓就任美國第三十九任總統的文本原文，可參閱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20, 1977, p. 26; *et passim*.

註④ See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uary 24, 1977), p. 11.

註⑤ See *Ibid.* (December 12, 1977), p. 16.

驗的調查，卡特初任總統時的聲望為百分之七十一。到同年三月，卡特的聲望升高到百分之七十五。^②這是卡特聲望的極峯時期。在政治學裏，有一種「循環波動」(cyclical fluctuation)的理論，解釋總統聲望的起落。根據這項理論，總統聲望的頂點是在和國會間的蜜月時期。以後，照例聲望開始往下跌。總統聲望下跌的情況，就如一位政治學家所說的：「不論總統作了甚麼，他的聲望總是往下降。幾乎不論他作何種努力，或不論甚麼人在作總統，都是一樣的。有好消息，聲望照跌不誤；壞消息，下跌得更快。毫無疑問的，產生總統聲望跌落的一種函數，部分在於他在蜜月期間所受到的那種吹捧，是他無法(也不可能)配得上的。」^③所以卡特也同樣受到這種函數的傷害。在他就任總統兩三個月之後，聲望就開始下跌。不過，令人意外的是，卡特行情下跌的情況却異於往常。其所以異常之處，一則，他的總統蜜月時期要比其他總統來得短，結束得快；二則，通常是因為總統犯了足以令人詬病的過錯之後，他的聲望纔開始下跌。詹森總統的聲望下跌，是因為他昇高了越戰；尼克森是因為水門事件爆發；而福特是因為特赦了尼克森的罪。但是卡特行情開始下跌，却沒有類似的原因。這也就是卡特所以成爲「謎」(enigma)的地方。

雖然說，卡特行情的下跌是「謎」，但是這個「謎」的謎底，早就顯露了蛛絲馬跡。要知道，當年華府受了越戰和水門事件的侵蝕而所籠罩的一層污染空氣，絕不是一時可煙消雲散的。然而卡特却誇言能負起清理污染的工作，正適合美國人的期望。所以卡特終能跨越越戰與水門事件的波浪，而來到華府，入主白宮。首先他提出行政改組和平衡預算的計劃，^④隨又兜售他的能源包裹。但是來到華府兩三個月後的卡特，已不再是華府的局外人。他繼任了福特的職位，也繼承了福特所遺留的一切，自然也要受到人們對尼克森和福特不信任的連累。所以人們對白宮的疑慮，也就從尼克森和福特的身上轉加於卡特。卡特自然也就無法享受長期的蜜月日子。

但是這個謎底，終於在幾個月之後被揭開了，那就是卡特視同手足的預算管理局長藍斯被控違法的財務事件。無可疑問的，總統的聲望並不完全決定在他個人的表現上，其左右人員的一舉一動，也往往會影響他聲望的起落。艾森豪時代的阿當斯(Sherman Adams)和詹森時代的傑金斯(Walter Jenkins)就是顯著的例子。阿當斯是艾森豪的高級助理，因爲接受賄賂而被起訴，使艾森豪的聲望打了折扣；傑金斯是詹森的顧問，曾因破壞秩序而被捕，使詹森的聲譽和地位受損。所以藍斯事件的發生，也使卡特所標榜的廉能政府受到懷疑。卡特的聲望也就再次大段的跌落。據蓋洛普民意測驗的調查，卡特的聲望在一九七七年八月時是百分之六十六，到九月却降至百分之五十五。

註②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11, 1978, p. 26.

註③ Quoted by Dom Bonafede, "Carter and the Polls," *National Journal*, X(August 19, 1978), 1312-3, from Thomas E. Cronin, *The State of the Presidenc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5).

註④ 關於卡特的行政改組計劃，請參閱拙著「論美國政府的行政改組」，刊於《問題與研究》，第十七卷，第三期(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第九三頁至一〇二頁。

四、尋覓「情勢機會」的一片苦心

雖然卡特在蓋洛普民意測驗中所受到的評價，毀譽參半，但是足使卡特無限隱憂的是，在其他各種民意測驗中，其聲望的地位的低落，則更甚於蓋洛普的測驗結果，而且是一路直線猛跌，從無起色，毀多於譽的情況，愈來愈甚。例如，一九七七年十月初，一項國家廣播公司的調查顯示：在接受抽樣調查的一千六百人當中，只有百分之四十六贊同他在白宮的表現。又如同一個月哈利斯民意測驗所作的一次調查顯示：對於卡特處理一般經濟問題，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表示不贊同；對於卡特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有百分之七十六表示不同意；另有百分之七十四不贊同卡特處理失業問題的態度。^{②⑥}

平情而論，卡特執政一年多以來，確實乏善可陳。他自始即與國會缺乏協調，以致能源計劃和稅制改革遭受百般阻撓；加上白宮人員又頻頻出錯，也一再更迭，顯示卡特優柔寡斷，缺乏效率，領導無能。至於對外關係，他倡導人權外交，却實行雙重標準，以致敵友不分，是非混淆，招來國際上的許多嘲笑、微詞、和懷疑。尤其在處理經濟問題方面，受到更多的責難與批評。因為通貨膨脹未見緩和、美元一再貶值，失業率也未見減低。所以卡特在國內外的聲望不斷低落，只有當年的杜魯門可以比擬，以致於被稱為「戰後最無能的總統」。

雖然卡特在國內外的聲望一再的跌落，但是白宮的人員却認為卡特本人的前途並不那麼暗淡悲觀。他們認為，這是繼水門事件之後，存在於新聞界和民間的一種普遍消極態度的現象。^{②⑦}事實上，卡特本人對民意測驗的評價也不十分重視。他說：「我大可根據民意測驗對我有利的因素來作每一項決定，但是在我看來，這並不是作為一位領袖的人所應有的態度。」^{②⑧}所以有人問他是否關切他的聲望的低落時，他回答說：「我覺得，民意測驗除作一時性的測驗之外，並沒有那樣的重要。要是我依賴民意測驗而為，我就不會出來競選總統了。」^{②⑨}這種說法正應了中國的一句格言：「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儘管卡特不承認民意測驗的重要性，但有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實是：民意專家康岱爾 (Patrick Caddell) 自始即跟隨卡特進駐白宮，身兼卡特的政治顧問，享有白宮參謀人員的地位，使卡特成為第一位聘有專職 (in-house) 民意專家的總統。雖然卡特的決策並不一定依據康岱爾的民意測驗來衡量他的咨文效果，以及測探可能遭遇的障礙。^{③①}據報導，康岱爾在一九七七年替卡特作了四次民意測驗，其中包括一次總統聲望的調查，約共花費八萬至十萬美元。^{③②}所以卡特說他不重視他的聲望的起落，未免

註②⑥ 參見國際現勢，第一一九期（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二十五頁。

註②⑦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4, 1978), p. 21.

註②⑧ Ibid.

註②⑨ Ibid. (August 21, 1978), p. 20.

註③① Bonafede, *op. cit.*, p. 1313.

註③② Ibid., p. 1315.

有點自欺欺人。

卡特爲挽回他日益下跌的聲望；又在一九七八年五月，聘用民意專家雷福助（Gerald Rafshoon）作爲總統的新聞交流助理，專司改善卡特給人的印象。雷福助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即一直爲卡特服務。在一九七六年卡特競選總統期間，雷福助的一項傑作，就是在競選宣傳上，將卡特塑造造成一種形像——一位道德領導者和平民主義者。這是卡特競選獲勝的主要因素。

雷福助爲了改善卡特給人的印象，以挽回卡特的聲望，首先即統一協調卡特人員的對外言論。其方法是：每週印行「白宮新聞與看法」，分發至政府各單位官員閱讀。每期「白宮新聞與看法」約四至八頁。第一期專載卡特就任總統以來的各項成就。^②所以從雷福助來到白宮之後，再也聽不到類似楊格（Andrew Young）等輩亂放言論的情形。這也是雷福助替卡特改善形像的一種成效。

然而雷福助的努力仍然無法挽回卡特在民意測驗中繼續下跌的行情，甚至連卡特自己的家鄉——喬治亞州——也只有百分之四十一的人願意在一九八〇年支持卡特競選連任。卡特的聲望所以一直萎靡不振，也許是因爲卡特「生不逢時」。他處在歌鼓昇平却又普遍消極的時代，他沒有邱池參議員所說的「情勢機會」（situation room）。馬雅古茲號事件是福特的「情勢機會」，使福特的聲望突然躍升。但卡特沒有這種際遇。所以在缺乏情勢機會和聲望日低的交相壓力下，卡特發現華府的生活幾乎無法忍受，於是離開華府、消磨在大衛營的時間，越來越多。也許是大衛營的寧靜帶來了卡特一項突然的靈感；使他領悟到「情勢機會」只有在國際上可以覓得，也只有自己去尋覓。所以一九七八年九月，卡特邀請比金和沙達特前往大衛營共度假期。皇天畢竟不負苦心人，「中東和平的架構」竟使卡特在各種民意測驗中的聲望大爲提高。單據蓋洛普民意測驗的調查顯示：卡特的聲望從百分之三十九升高爲百分之五十六。^③無怪乎有人說這是卡特的「復活」。

不過「中東和平的架構」畢竟是時效的催生劑。過了十二月十七日這項架構如果仍不能替中東和平催生，便將成爲一針廢料。卡特眼看這付催生劑即將失效，中東和平，又將成爲泡影，在「病急亂投醫」的情況下，終於擲出一張預藏的「中國牌」，希望藉此緩和一下中東和平難產的陣痛，同時避免他自己聲望的再度跌落。

不幸的是，卡特違背了牌規，在他不該出牌的時候，却從一付缺乏王牌的短門牌上，擲出所謂「中國牌」墊張，不但沒有收到重振聲望的預期效果，反而慘遭美國民衆和國會的交相指責，並且招致蘇俄的抵制和美國盟邦的疑慮，這也許是卡特始料所不及的。

註② Se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25, 1978, p. 6.
註③ *National Journal*, X(Oct. 14, 1978), p. 1642.